

# 周恩来党内斗争思想及其对党内和谐的贡献

张红安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周恩来对执政党内个人主义、官僚主义, 对冒进主义、极“左”思潮等开展了严肃的斗争。但周恩来反对事事斗争, 谨慎定性党内斗争性质, 反对把党内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 强调思想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长期任务, 党内政治斗争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 在领袖的错误面前, 注意处理好维护事业与维护领袖威望的关系。周恩来这种“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党内斗争思想, 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 执政党; 党内斗争; 党内和谐

**中图分类号:** A 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9)06-0728-04

和谐由对立和斗争中产生。从和谐这一本质属性出发,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 是“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周恩来能够正确认识并实践党内斗争, 其执政党党内斗争的思想, 对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 一、对执政党内错误开展严肃的斗争

周恩来对党内错误一向严肃地进行斗争。周恩来对执政党内错误的斗争, 集中体现在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官僚主义, 对冒进主义、极“左”思潮的批判上。

(一) 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但提出要划定政策界限。在七届四中全会上, 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sup>[1]121</sup>, 指出必须严格党的纪律, 制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但在批判的同时要注意三个区分: 一是把高饶与其他地方领导人加以区分,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这些, 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sup>[1]121-122</sup>; 二是把高饶个人主义与干部中的危险骄傲情绪加以区分,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

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 是因如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 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sup>[1]122</sup>; 三是把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加以区分, “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 争夺权位, 破坏党的纪律, 进行反党活动”<sup>[1]125</sup>。这三个区分不仅厘清了党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也划定了避免扩大打击面的政策界限。

(二) 反对官僚主义, 但提出要对症下药。建国后领导机关干部中官僚主义作风逐渐蔓延。对“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周恩来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利用各种场合严厉批判。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更是一篇反官僚主义的檄文。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批判官僚主义现象。周恩来从工作作风、机关作风、生活作风、政治品格等方面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 二是分析官僚主义产生原因。周恩来指出, “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 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sup>[1]418</sup>; “如果在中央呆久了, 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 就会比地方容易

收稿日期: 2009-08-13

作者简介: 张红安(1964-), 女, 江苏淮安人, 法学硕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研究。

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sup>[1]209-210</sup>；“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sup>[1]223</sup>等四方面的因素；三是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即精简机构、领导机关接触实际、上下级互相监督、加强思想教育等。周恩来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没有无限上纲，而是对症下药。

(三)反对冒进主义，但不参与对“大跃进”的攻击。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希望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毛泽东“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sup>[2]351-352</sup>。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冒进，更反对“大跃进”，他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sup>[1]234</sup>。在意见不被接受、受到不公正批判并失去经济工作领导权时，周恩来开展实地调研，不断提高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在规律和事实面前，从郑州会议起，毛泽东开始退却，并把经济工作指挥权重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投入工作，使国家渡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962年1月起，党内掀起了对“大跃进”重新评价的浪潮，但周恩来没有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比起那些极力诋毁大跃进的人来，周在阻止‘大跃进’方面做的实事要多得多”<sup>[2]362</sup>。

(四)反对极“左”思潮，在实际工作中纠“左”。极“左”思潮是在“文革”特殊环境下滋长出来的错误思潮，也是“文革”错误的集中表现。周恩来在“文革”狂飙中，日益认识到极“左”思潮的危害。但“文革”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周恩来设法在实际工作中纠“左”。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集中纠正对待老干部和经济工作中的极端做法。1966年9月10日，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就表达了对将干部一棍子打死做法的不满：“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里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说所有党政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都是，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在这些地方落空了吗？”<sup>[3]1871</sup>在经济工作中，周恩来竭力维护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扰

乱正常生产。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有限范围内调整政策，周恩来则加大纠“左”力度，表现为开始在理论上批判极“左”思潮，给极“左”思潮下定义：“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sup>[3]2020</sup>，组织《人民日报》揭批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批驳“打倒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极“左”谬论；还表现在把纠“左”扩大到文教、外交等更广阔的领域中。但毛泽东不赞成林彪是极“左”的提法，而认为是极右。面对分歧，周恩来不着意于字面争论，而注重实效。在周恩来努力下，大批遭迫害的老干部得到解放，邓小平复出工作，各条战线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拨乱反正。

## 二、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sup>[4]1484</sup>毛泽东的这一讲话集中反映了他的执政党党内斗争观，并对此后的党内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周的一生中，都力图以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方式处理党内斗争”<sup>[2]110</sup>。

(一)“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党内斗争”一词在国际共运史上有100多年历史。1882年10月20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斯坦信中首先提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sup>[5]</sup>列宁也曾提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和机会主义“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sup>[6]</sup>。恩格斯、列宁从哲学和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论战的角度指出了党内斗争的必要性。但斯大林得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进程，引起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党内斗争的尖锐化”<sup>[7]537</sup>的结论，则把党内斗争引向了绝对化。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宣布：“党对于一切反布尔塞维克的倾向，不能稍事妥协与让步，断无所谓党内和平。”<sup>[7]352</sup>对党内斗争的推崇及对“党内和平”的否定，使中共党内始终存在泛斗争化倾向。周恩来在1948年2月的一封党内信件中则提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

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sup>[18]287</sup>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同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sup>[1]334</sup> 周恩来的思想十分清楚:党内政治问题需要彻底的斗争,思想作风问题通过批评予以纠正,由具体问题上认识与处理方法不同产生的分歧则不是错误。周恩来既坚持原则问题上的党内斗争,又承认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党内“和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高饶“进行反党活动”,官僚主义危害党和国家工作并导致干部队伍政治上蜕化,周恩来与之坚决斗争,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则“心情非常沉重,忧心忡忡”<sup>[4]1485</sup>。

(二)“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受斯大林错误结论影响,中共党内还存在着把党内矛盾和斗争都归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把党内斗争等同于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倾向。“文革”中出笼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指导思想即是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始终贯穿着两条路线斗争”<sup>[7]533</sup>。周恩来对党内错误定性非常慎重。周恩来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李立三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的路线错误帽子,认为只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sup>[9]</sup>。“文革”爆发后,中央和地方大批领导人被指责犯了路线错误,1966年10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更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质疑: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sup>[3]1879</sup>。周恩来并不认同党内斗争都是路线斗争,更不认同阶级斗争的说法,对于党内尤其执政党内出现的问题,周恩来认为主要是由旧的思想作风、习惯势力造成的。因此,改造旧思想、肃清旧习惯势力的“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sup>[1]332</sup>。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分析毛泽

东错误时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对此邓小平十分赞成:“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sup>[10]</sup>邓小平与周恩来立场具有相通之处。

(三)“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把党内斗争等同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导致了对党内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方针的出台。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错误方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被放大使用。周恩来则认为,对于作为长期任务的党内思想斗争,最好的方式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政党内的政治斗争则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在反对高饶斗争中,周恩来强调要严格党的纪律,1962年进一步告诫全党不要乱批乱斗:“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sup>[1]351</sup>“文革”中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而横遭迫害,周恩来直言呼吁:“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sup>[3]1877</sup>周恩来始终期望党内理性斗争方式的回归。

(四)党的领袖不是“天生的圣人”。冒进主义和极“左”思潮是由毛泽东晚年错误引发的,周恩来始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错误,而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这种方式与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观密切相关:“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接着强调,“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因此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人”<sup>[8]331-334</sup>。周恩来一方面深刻认识到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的旗帜,依然是引领建设新中国的光辉旗帜;另一方面也科学地认识到领袖也会有弱点,也会犯错误。因此,周恩来衷心拥护毛泽东,全力维护毛泽东,但在领袖出现错误时也没有失去原则立场,只是注意方式,处理好维护领袖威望与维护事业的关系。

### 三、对增进党内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恩格斯说：“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sup>[11]</sup>恩格斯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是“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周恩来执政党党内斗争思想，对增进党内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这一思想有利于纯洁党的思想，端正党的作风。纯洁的党才是和谐的党，才能永葆青春。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思想纯洁、作风优良的主要体现。但执政党党内斗争中的泛斗争化、把阶级斗争做法搬进党内，等等，其实质是脱离了执政党的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周恩来认识分析执政党内部矛盾斗争，首先立足于正确判断党的现状。1948年在指导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运动时，周恩来指出：“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sup>[8] 296</sup>1948年2月的党内信件中则明确提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sup>[8] 287</sup>。正是在研究党的实际并正确判断党的现状的基础上，周恩来得出了党内无需事事斗争、思想斗争是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等一系列关于党内斗争的重要认识。周恩来准确把握执政党实际，正确分析处理党内矛盾斗争，对于保持党的思想路线的端正，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品质至关重要。

(二)这一思想有利于保持执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弘扬党的民主作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和谐的基石。但在执政党党内斗争中，把党内斗争当阶级斗争，把有错误甚至是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当党内斗争对象，既不利于党内问题的真正解决，更会压制党内的不同声音，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周恩来提出，“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sup>[8] 287</sup>。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损害严重，周恩来不仅指出了这种现象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sup>[1] 323</sup>周恩来上述思想的

核心在于：允许批评自由是党内民主的标志，领导者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表率，这也是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最好方式。周恩来的这种思想观点既有助于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又有助于维护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三)这一思想有利于维护党的纪律，推动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党的纪律是党的法规，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党的纪律、制度也是党内和谐的保证。但在执政党党内斗争中始终存在着的急于上纲上线的粗暴做法，却不利于党的纪律执行和制度建设。周恩来高度重视党的纪律：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sup>[3] 1782</sup>；在历次党内斗争中，周恩来都十分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按党纪国法处理。此外，周恩来还着眼于通过推动党和国家制度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凡是机关大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等反官僚主义的措施，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建立等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周恩来以宽广的眼界，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这一思想有利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稳定。安定团结是党形成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内和谐的基础。执政党党内的过火斗争、互相攻讦影响了党的团结与稳定。周恩来深刻理解了团结的意蕴：“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sup>[1] 29-30</sup>同样，周恩来也深刻理解了党内斗争的目的。1945年周恩来在大后方文化人如何整风的意见中即提出：“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sup>[8] 188-189</sup>1957年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再次指出：“最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今天主要的一环还是发展生产，搞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思想上的风也就好多了，实际了，宗派主义也会少了，官僚气也会少了。”<sup>[4] 1330</sup>斗争是为了团结，党内斗争是为了推

(下转第 766 页)

科学》1998年第 1期;王子今《清人上海竹枝词透露的近代化气息》,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 1期。

- ② 王慎之、王子今《咸丰十年北京兵火纪实——记无名氏〈十年都门竹枝词〉》,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 3期;王子今、丘逢甲《〈台湾竹枝词〉的文化意义》载《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 [ 1 ] 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 历代竹枝词: 第 3 册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 [ 2 ] 齐思和, 林树惠, 寿纪瑜. 鸦片战争 [M] / 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丛刊: 第一种第 4 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4.

- [ 3 ] 齐思和, 林树惠, 寿纪瑜. 鸦片战争 [M] / 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丛刊: 第一种第 1 册.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54.
- [ 4 ] 胡滨. 鸦片战争 [M] /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 第 3 册.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 [ 5 ]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 [ 6 ] 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 近代中国史稿: 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 [ 7 ] 恩格斯. 英人对华的远征 [M]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责任编辑: 仇海燕

(上接第 731 页)

动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 所以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 注意划定政策界限, 避免上纲上线, 竭力降低斗争的残酷性, 缩小波及范围, 其结果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党的稳定, 维护了最高领导层的团结。

正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 但反对事事斗争, 谨慎定性党内斗争性质, 反对把党内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 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斗争是党内斗争的长期任务, 党内政治斗争应以党纪国法为准绳, 而不能乱批乱斗, 在领袖错误面前, 注重方式。周恩来这种“尊严、理性而不夹杂感情色彩”的党内斗争思想, 为党内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对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增进党内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 [ 1 ] 周恩来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 2 ] 韩素音. 周恩来和他的世纪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 [ 3 ] 金冲及. 周恩来传: 第 4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 4 ] 金冲及. 周恩来传: 第 3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 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370.
- [ 6 ] 列宁全集: 第 3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43.
- [ 7 ] 冯建辉.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 8 ] 周恩来选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 9 ] 金冲及. 周恩来传: 第 1 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76.
- [ 10 ]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07.
- [ 11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315.

责任编辑: 张 超